宁波地名谭

那些令人心紧的『台风系』地名

镇江塘、常泛洪、洪溪……

徐雪英

地处东海季风气候区的宁波，在享受海洋丰厚馈赠的同时，还经常要和一个接一个的台风打交道，是我国台风常灾区之一。气象资料显示，1953年至2016年，平均每年约有2.4个台风影响宁波地区，其中造成严重影响的台风平均每1至2年就有1个。宁波境内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和台风以及洪灾有关的地名，记录着滨海地区人们的不易和艰辛。

老涨浦庙也称老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宁波北仑小港街道有镇江塘，村民主姓沈，清同治年间从朱田村王家洋迁入。村后有甬江，江畔曾筑江塘，遇台风常倒塌，因此得名倒江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改建成坚固的堤塘。因为希望这次修建的江塘能在台风时镇住江水，村民改称“倒江塘”为“镇江塘”，村以塘名。

除希望能镇住江水外，宁波人还希望能镇住海水。作为大自然中最具破坏性的灾害之一，台风具有多重性、易灾性等特点。除给影响地区带来狂风暴雨外，还常引起海水倒灌、海塘摧毁等灾害，对沿海一带破坏力很强。

象山丹东街道有门前涂塘，因1956年强台风而建。这个台风于当年8月1日凌晨在象山南庄登陆，因此俗称“八一”台风。台风风力非常强，登陆时甚至吹毁了气象部门的专业测风仪。最后，宁波气象部门根据气压自记纸上呈漏斗状变化的气压值测算，其风力在16级以上。

伴随狂风而来的巨潮，使南庄附近五公里内转眼变成汪洋。台风过后，痛定思痛的象山人开始在南庄平原围涂修塘，于翌年建成门前涂塘，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拓宽加固海塘。1972年，又在门前涂塘以南修建另一座海塘，让南庄平原从此有了两大抗台屏障。

因为相信以后不会再受台风带来的毁村之灾，当地人给后一个海塘取了个甜蜜的名字——幸福塘。随着象山大目涂等围垦工程的不断推进，门前涂塘和幸福塘的挡潮防浪功能渐渐减弱，后沦为内塘。

丹东街道还有寨里村，也和“八一”台风有关。寨里村原位于赤坎水库东侧，炮台山西北麓。明代陈姓家族自金华迁入，继而练姓家族亦从福建迁此。明正统八年（1443年），为抗击倭寇，政府在此建游仙寨，派爵溪军驻守。因村在寨城里，故名寨里。1956年大台风过境时，村落尽毁，村民移至寨城南重建，村名仍称寨里。游仙寨抗倭遗址今仍存，是研究宁波明代军事、兵营设置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浙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1956年的“八一”台风，不仅对象山破坏严重，对宁波其他地区也产生很大影响，摧毁了不少房屋和古迹。

如鄞州下应街道的田畈王村，因“八一”台风而外迁。田畈王村村民主姓李，清朝年间形成村落，村庄位于今下应街道史家码村工业区内。“八一”台风吹毁村内大部分房屋后，村民陆续外迁，多迁至史家码，少量迁至陆家桥，原村庄一段时间内成为畜舍。

再如海曙长春路上的庆云楼古迹，因“八一”台风而消失。庆云楼也称八角楼，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由海道副使王应华始建，以建楼时有祥云显上空而名庆云楼。1929年，八角楼改设成“教养所”“残废所”，宁波坊间因此流传有“八角楼下小鬼多”俗语。“八一”台风过境时，年久失修的庆云楼被吹毁，残楼于几年后拆除。

还有如江北槐树路上的古槐树，因“八一”台风而摧毁。《鄞县通志》记载，槐树路一带旧称槐花树下，以百年大槐树而名。强台风过境时，大槐树正位于当时宁波机械工业学校内，被狂风暴雨连根拔起，槐树路也由此失去了古树地标。

三

类似这样的地名，在宁波还有很多。

江北洪塘街道有赵家洋，始居赵姓，村傍箭港，地势低洼，旧时洪水一来便成一片汪洋，故名“赵家洋”。相似的还有海曙石碶街道汪家，村民多于上世纪40年代从绍兴迁入，姓氏庞杂，以渔民居多。因村里地势低洼，台风季节洪水难排，一片汪洋，故戏称“汪家”。

宁海一市镇有上塘厂，位于青山港畔。村建于清光绪年间，初由王姓居此管塘。1929年，洪水冲毁塘岸，淹没村庄，村民转移至南庄。后海塘修复，村民迁回。因当初住草厂（草棚），又地处上塘，故称上塘厂。

宁海深甽镇曾有常泛洪，村处大蔡村北溪谷间。大蔡胡氏，于清嘉庆年间迁此定居。因村旁溪流狭窄，台风季洪水泛滥而名常泛洪，后谐音为长方红。

鄞州新明街道有老庙，又名老涨浦庙。民国《宁波府志》记载：“鄞东十五里老庙村，唐天宝二年（743年）建东灵庙。明嘉靖二年重修，更名为涨浦庙。清同治十三年再修时，因梅墟建新涨浦庙，故改称为老涨浦庙。”关于老庙祀主，一说祭祀平浪侯宴公，另说祭祀西汉清官梅福。传王莽摄政时，梅福弃官来鄞东隐居，时逢甬江一带台风频繁，海水侵入农田，他带领民众修水利，筑江塘防洪，为民办了实事。后来，民众塑梅公神像，在庙中祭之。

奉化莼湖街道有洪溪，村处象山港畔。居民主姓王，明洪武四年（1371年）由本县万竹迁入。村东有大溪，名大溪堰（大溪沿），因溪呈弧形，颇似彩虹，故又名虹溪。后因此地洪水泛滥，水势迅猛，故谐音“洪溪”，沿用至今。

慈溪龙山镇有小施山，由各地移民迁居而成。每遇台风，居民均逃至村南五公里之施公山躲避，因名此村为小施山。

老话新聊

三日勿吃鲜 螺蛳带壳咽

桂晓燕

都说宁波人口福不浅，自古以来靠海吃海。这个海就是渔业资源丰富的东海，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就在这里。舟山渔场以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乌贼）为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其他虾兵蟹将也阵容浩大。海鲜海鲜，就是吃一个“鲜”字，宁波人最喜欢的菜肴非海鲜莫属。“三日勿吃鲜，螺蛳带壳咽”这句老话，将宁波人对海鲜的钟爱，形容得淋漓尽致。

从宁波出去创事业的人，不管在外面吃过多少美食，最难忘的依然是小时候吃过的海鲜。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首金的宁波姑娘杨倩，赛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她现在最想吃“妈妈做的油焖大虾”！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得主是宁波小伙子汪顺，他被问及最想吃什么菜时，不假思索地答道：“外婆做的红烧带鱼！”嗨，8月1日东海刚开渔，想吃油焖大虾和红烧带鱼的，快来宁波！

当然，也不仅是海鲜，还有其他各种充满老宁波味道的吃食，令天涯游子念念不忘。如别具风味的臭冬瓜，土头土脑的灰汁团，鲜爽可口的油焖笋，松脆香酥的千层饼等等。这些东西称不上高级，但从外地回家乡的老宁波说：要的就是这个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当然，也不仅是舌尖上的宁波，更有对故乡的深深眷念。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已经多大年纪，故乡永远是魂牵梦绕的地方。前几天，笔者意外收到一份来自美国旧金山的邮件。发邮件的是一位从联合国退休，1941年毕业于宁波中学的名叫黄圣仪的长者。16年前他从美国回宁波扫墓并重访母校时，笔者曾采访过他。当年黄先生83岁，算来如今已是99岁高龄了。退休后定居于旧金山的黄老先生，从大洋彼岸万里之外，看到家乡宁波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打造的三江口璀璨夜景，欣喜异常，深受鼓舞，特地通过上海的老友辗转打听到联系方式，发了邮件过来，为的是向宁波致以“钦佩庆贺之意”。

这位黄圣仪老先生，他那极富特色的经历，以及对祖国、对家乡、对母校那种至纯至真的深爱，很值得聊一聊。众所周知，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在联合国担任国际公务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们的宁波老乡黄圣仪，不但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国际组织工作了31年，而且出类拔萃，成就卓著，得到同事们的普遍赞赏。

黄圣仪是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的。1951年，联合国秘书处公开招考中文译员。当时已从大学毕业6年的黄圣仪正在华盛顿，就报了名。经过激烈竞争，他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进入了联合国秘书处。世界上人才济济的地方多得很，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联合国那样，集中五大洲四大洋的各类精英。黄先生告诉我，自己之所以能在这个人才荟萃、强手如林的环境中如鱼得水，离不开母校宁波中学给他打下的基础。黄圣仪在宁波中学求学的日子，是宁中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兵荒马乱。为避战祸，学校被迫四迁校址，流亡于鄞县、嵊县、东阳和磐安等地的穷乡僻壤。尽管条件极端艰苦，师生们食不果腹，夜难安寝，然而宁波中学的优良校风，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仍如春风化雨，让学生们受到良好的启蒙。

1973年，黄圣仪在阔别故乡26年后，终得第一次回来探望。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联合国资深工作人员，此后黄圣仪多次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以贵宾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宁波人，一个曾在宁波中学读过书的学子，他还以恩师吕漠野的名义，在宁波中学设立了奖学金。黄圣仪先生不愧是爱祖国爱家乡的炎黄赤子。

爱祖国爱家乡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可以说，爱家乡的美食是爱家乡的一部分，爱家乡是爱祖国的一部分。“三日勿吃鲜，螺蛳带壳咽。”宁波人能离得开海鲜吗？现在东海小开渔，阿拉宁波人又可以吃到透骨新鲜的海货啦！

新知

应科学界定“城乡”概念

党国英

在农村调研中常常能碰到一种情形，调研所在地的官员推荐的有些参观点其实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功能区，甚至就是一个小城市。有的地方向调研者提供的支农项目，仔细辨别，也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城市建设项目。城市当然要发展，笔者甚至认为乡村振兴大业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来完成。但是，城乡建设的实际操作需要精准，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

推进城市化、大力振兴乡村，都不错，但如果真正落到实际工作层面，就会发现不同的人所讲的城市与乡村可能不是一码事。在目前的一般性政策文件中，讲农村工作领域时，还是把县城以下的区域以及城市行政区内的区辖镇村看作乡村。概括地说，我们的城乡界定主要用来适应行政管理需要，与实际人口布局观察的需要不匹配，没有形成一套稳定的区划规则来按照实际人口布局变化不断调整市镇设置。目前流行的关于城市化率、农民收入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反映国民经济结构。

城乡界定方面的问题会对国民经济管理产生误导。首先，城乡界定不科学不利于形成精准政策指向。宽泛的乡村概念夸大了国家对乡村的投入，难以避免农业投入的“非农化”倾向。其次，城乡界定不合理也不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流动。有的民间投资项目名义上投到了农村，发展所谓兴农产业，得到了政府支持，但长期看与农业现代化无关，还因为失去了非农投资的聚集效应，形成了低效率投资。最后，城乡界定的含糊同样不利于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目前的建制镇角色定位比较尴尬，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不强，亟须正名。

往更深层次看，我们经常习惯于一种“差不多”的管理思维，对城乡界定清楚与否的问题不大在意。而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乡的严格界定比较重视。美国有四个联邦机构从自己的工作需要出发，对城市与乡村采用了多个不同的界定准则。因为界定的原则十分明确，所以不仅不会引起混乱，反而使统计观察结论可以相互参照，有利于对城乡发展趋势作出更好判断。

今年，欧盟等六大国际机构，形成了一个关于城乡界定的研究报告（城市化水平判定——国际比较中定义城市、市镇和农村的方法手册），提出的界定城乡的方法，把人口分布聚落划分为3个类别，分别是城市、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与乡村。

方案对3个类别的具体认定原则是：城市：在连续的若干单元中，每个单元的人口密度大于等于1500人，居民点相互连接，人口总量超过5万人，且至少一半人口处于地理上完全连续的中心区。按这个定义，设想一个松散型、类似美国的最小城市情形：3平方公里居住2.5万人构成核心区，其余2.5万人住在与中心区域相毗邻的约16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且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大于1500人。当然还可以设想一个紧凑型最小城市的情形，如荷兰的小城市。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在连续的若干单元中，排除城市群中的市中心区域，每个单元的人口密度大于300人，人口总量大于5000人，居民点有分隔，且中心区域的人口不超过半数。

乡村：去除以上区域后，目标区域的其他部分都是乡村。

手册中提及的城乡界定不是简单地只划分城市与乡村，而是在二者之间加上了一个“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从这一点看，它也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考虑作为我国人口布局统计方法改革的一个思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读史

泥马渡江，埋马许诺……

传说背后朴素的爱国情怀

潘玉毅

慈溪市横河镇有一个埋马村，旧称埋马里或埋马市。村中有一座埋马山，相传山脚下曾经埋过一匹马，因此为名，又以此名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地名。

想来，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埋马”这个村名，或是看到“埋马”二字，脑海里定会浮现一连串疑问——是谁在这里埋马，因何埋马，埋的又是什么马？

埋马村的来历，与两宋之交的一个民间故事有关。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金兵步步紧逼，迫得他一路南逃。后世出于统治的需要及国家权威象征的考量，为了表示高宗即位乃天命所归，炮制了许多传说，民间流传极广，由泥草填塞河道转变而来的“泥马渡江”便是其中之一，传说也与村中之人浓浓的爱国之情有关。

说的是赵构被金兵追赶，一路狂奔至海边，海边有一破庙，庙中有一泥马，泥马虽为死物，却雕得栩栩如生，“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赵构四下里寻不到渡河的船只，眼看追兵将近，他对着泥马自言自语起来：“马啊马，你虽生得丰神俊朗，可惜是泥做的；你若是一匹真马，能够渡我过海就好了。”谁知话音刚落，泥马腾空而起，驮上赵构朝着海的对岸疾驰而去。追赶的金兵尾随而来，因海面上雾气茫茫，看不真切，见赵构在前面跑，也就跟在后面追，结果连人带马陷在海边的滩涂里，进既进不得，只能狼狈地爬回岸边。

泥马驮着赵构在对岸登陆之后，变成了一堆散沙和一摊水渍，也有说泥马力尽，化为水边卧石的。因恐敌人追来，赵构将“马”就地掩埋，并许下诺言，待其南面称帝，必为泥马塑像立庙，使它得享村民香火供奉。此事一经流传，明明是赵构仓皇出逃，时人却备受鼓舞，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赵构不是天命所归，焉能有“泥马”神迹？

事关民族存亡的信息，总是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牵念。当地人为了纪念那匹护主的马，造了个埋马庙，还将村庄命名为埋马村。之所以这个传说会经久不息，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因为人们心里深爱着这个国家，不愿君王、江山落于敌手。

人们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与“真命天子自有神人庇佑”的说法高度契合，既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焉会被金兵所害？不难看出，它寄托了时人朴素的爱国情怀及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美好愿望。

遗憾的是，赵构南渡之后，登基为帝，甘愿偏安一隅，在前线军队反击金兵入侵已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兵权，派人与金人议和。“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只可怜那失地的宋室遗民，他们的期盼再一次落了空。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埋马庙已经没有了，埋马山也几近平毁，许多古建筑、老物件消散如云烟。但因“埋马”故事产生的地名和传说，却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见证了一代代百姓亘古不变的爱国之心。

漫画角

不出去『丸』

田志仁 绘

登顶了

张吉亮 绘